

两汉时期的荆州刺史为何不治江陵

方珂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两汉之际荆州的治所所在地, 先治汉寿, 后迁襄阳。而作为南方重镇的江陵却未理所当然地成为治所所在。这其中有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而现实的原因。第一, 从政治地理上来看, 除荆州外十一州之治所都在长江以北, 因此荆州治所落户长江以南, 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示。从地缘政治看, 江陵、长沙这两个侯国存在的政治影响, 汉庭不可能让它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第二, 从江陵的城池史来看, 由于江陵被灭楚之战破坏得相当厉害, 失去了故郢昔日的光彩。第三, 从军事上来看, 西汉荆州南方战事频繁, 所以治汉寿; 东汉后期北方势危, 治所北移襄阳, 与现实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

关键词: 荆州刺史; 治所; 江陵; 汉朝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6-0726-04

两汉时期的政区地理, 上承秦代的郡县制, 下为后来中国两千年的州县制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武帝将全国郡县设为十三部州后, 在各个监察区域设置州牧或刺史进行管理督察^①。西汉时期刺史不常置, 治所无载, 东汉时期荆州治所所在地落在了汉寿, 即武陵郡下的故索县(阳嘉三年更名), 今日的常德市东北。至东汉末的时候, 荆州牧刘表活动在襄阳一带, 荆州治所又移到了襄樊。而纵观秦以来两千多年历史, 洞庭一带的湖广地区行政中心长期都是以江陵为治所所在。为何产生这种变化?

首先看一下刺史制度的由来和变迁。起于元封五年, “至武帝攘却胡、越, 开地斥境, 南置交趾, 北置朔方之州, 兼徐、梁、幽, 并夏、周之制, 改雍曰凉, 改梁曰益, 凡十三部, 置刺史”^[1]。《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言其沿革: “监御史, 秦官, 掌监郡。汉省, 丞相遣史分刺州, 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 掌奉诏条察州, 秩六百石, 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 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 元寿二年复为牧。”这其中透露出关于西汉刺史的两个重要信息: 一, 不常置。既是不常置, 那么没有固定的治所也在情理之中。二, 从最初的长史级别的“秩六百石”, 至后来成为“秩两千石”的大吏, 行政级别提升了很大, 其相应的行政职能也应有较大提高。到东汉时期, 刺史制度也有一些变化。建武十八年, “罢州牧, 置刺史”^[2], 灵帝中平五年, 又“改刺史, 新置牧”^[3]。这

时的刺史(或称牧)已经由单纯的监察官发展为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要员, 三国中的“荆州牧刘表”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聚众为兵, 自保一方。各地太守、州牧拥兵割据, 互相攻伐, 成为东汉末年全国分崩、军阀混战的最直接因素。只是从东汉刺史已成为地方军政要员可以推断, 每个州起码是有一个固定的州治所了。武帝设十三州后, 州治所还不是正规的官方机构, 《汉书·地理志》中不见记载, 这同“遣史分刺州, 不常置”是对应的。《后汉书·郡国志》中正式有了刺史治所的简单记载, 这也是同刺史(州牧)的军政权力的扩大而坐拥一方相对应的。刺史治所一般位于先秦时的名邑或其附近, 如青州刺史治临菑, 并州刺史治晋阳, 幽州刺史治蓟。但是南中国的重地——荆州, 其治所比较意外地落在了汉寿县, 而非先秦的楚都江陵。其中的原因, 笔者认为可有如下几个:

首先, 是政治地理上的原因。武帝分封的十三州, 交趾州治所未见记载(可能未设, 也可能地点未明而未载), 除荆州外十一州之治所都在长江以北。对于偌大疆域的汉帝国, 这不能不有些上下不合比例。如果荆州治所在江陵, 那么长江以南就没有一个汉朝廷的州治所了。因此荆州治所落户长江以南, 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示。再有, 从地缘政治看, 在武帝即位以前, 江陵曾是临江国的都城, 由于刘嫫和王美人欲立刘彻的宫廷阴谋, 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刘荣就被废黜此地, 而深得百姓同情, “荣行, 祖于江陵北门, 既上车, 轴

收稿日期: 2007-09-17

作者简介: 方珂(1976-), 男, 湖北沙市人,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2005 级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区域军事地理。

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4]后被迫害自杀，“百姓怜之”^[4]。而汉寿以南的长沙郡自高祖以来就是长沙王吴芮的封地——长沙国，史称“(芮)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5]，自高祖至文帝，莫不以其长沙国的南方军队对抗南越，这一招是非常明智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征南越的军队都因为对南方气候不熟而惨败过。从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可见，最迟至文帝始，长沙以南的防务完全由长沙国军队担负^[6]。可以想见，虽然这两个侯国因为无人后继而国除，但是由于政治影响还有一定存在，在文景时代由于多用和抚政策，未多干预，到了雄心勃勃的武帝时期不可能再让反抗强度大且有政治基础的楚地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之外。因此，处于江陵和长沙腰膂之地的汉寿就成为上下兼顾的合适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可以从江陵的城池史来看。江陵是故楚的都城，终两汉之世，未见有以江陵为州政治活动中心之记载。《读史方輿纪要》中江陵县下记载有“自晋以后，皆为州郡治”。^{[7](3654)}。《輿地纪胜》中江陵府沿革中记有“武帝置十三部史而荆州刺史治于此，后汉因之”。下面的释文中有：“此据《晏公类要》。按《通鉴》，献帝祀平元年刘表为荆州刺史，单马入宜城，后自宜城徙治襄阳。《通典》云，荆州刺史初理武陵，后理南郡，俱不同。”^{[8](2187)}这说明古人对两汉时荆州治所所在地比较模糊，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应该说，《通典》所云是正确的，两汉史中不见有荆州刺史设治江陵县的记载，而且非常少见刺史活动在江陵的记录，只有《南齐书·州郡志》中载：“汉灵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在东汉末期才开始治于江陵。笔者个人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当年白起灭楚后，作为楚都的纪南城毁于兵火。因白起进行的战争都带有强大的破坏性，“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於河中”^[9]，“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乃挟诈而尽阬杀之”^[9]，“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10]。若是白起对楚都进行了屠城，并毁灭城池，虽然史书未明载，但是以其隳突好杀的一贯作风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的荆州城在以前的楚都——纪南城的东南向，有六里之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该城池经历代重修，层层叠压，但是最下面一层夯土城墙，是建于东汉中后期，而且从东汉后城址一直没有变迁过，这和荆州地区民间传说的关老爷修筑荆州土城是对应的。《读史方輿纪要》中荆州府下记：“晋初荆州或治襄阳，或治江陵，渡江以后不常阙理。太元十四年王忱始于

江陵营城府，此后遂以江陵为州治。”^{[7](3651)}直到晋代，江陵城才得到正式修缮。笔者推测在东汉以前，由于江陵被灭楚之战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一直失去了故郢昔日的光彩，这应该也是于两汉之世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缘故。东汉时代荆州城重建后，加之三国时魏蜀吴在此地交战不断，充分体现了其战略价值，才使其重新成为今后两千年间湖广一带的政治中心。虽然湖广的长沙也有政治功能，但早期是因为长沙封国的原因，后期是因为南方用兵而对洞庭以南管理的需要，而且主要是作为军镇，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就表明了长沙的军事防守作用。

还有一方面，可从军事上来分析。汉寿所在的武陵郡距离南越不远，在西汉征服南越之前作为刺探军事情报和后勤的基地是不错的选择，里耶秦简中多次提到“索”，表明该地是在重要的水路驿路上^[11]，秦取楚黔中郡，就是自巴蜀浮江而下抵达沅水地区。所以西汉的时候虽史书无载荆州刺史治所，但临沅(今常德)地区当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当时的荆州区域包括广大，治理整个中国中南部，而江陵县在州偏北，对于洞庭以下确实有些鞭长莫及，军令政令难以下达，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即“蛮夷”的战争频繁。西汉时因与北方匈奴族的长期战争，汉庭对于南方经营不多，虽广开疆域，但管理成效不高；而东汉时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远遁，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已大大削弱，汉民族的活动区域逐渐向南方延伸，因此与西羌及南方蛮夷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民族矛盾。观看后汉书中，明确记载有“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12]，“长沙蛮反”，“武陵蛮寇”的字眼则频繁可见。笔者将《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年间汉军与武陵蛮的战役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这十二场战争，汉军失败三场，招降三场，只有一半的成果是胜利的。也就是说，汉军相对少数民族武装并未形成绝对优势，所以战争也一直长期继续，直到三国时代仍能看到征武陵蛮的记录^②。既然长期战争，武陵又很偏远，因此，若治所设在江陵确实劳民费时，如同燕王当年为抗击北元将都城迁往北京一般道理。而且上面的表中还有武陵蛮一直攻击到江陵的记录，可见江陵也不安全。至于后来，刘表入襄阳，长期活动在襄樊，“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13]。荆州治所迁往襄阳，这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密切关系的。

东汉末年的荆州，北有袁术曹操，东有孙坚父子，西有刘璋，无论何方均为强敌，若不守襄樊形胜之地，

荆州根本无可保。《读史方輿纪要》中这样评论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併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昔人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併江陵也……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可以固东南也……自昔言棋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滢洳之地，通杨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7](3484)}这段话明晰无误地指出襄阳对于中原之地的的重要性。所以当时刘表必得以襄阳为镇守之处，不然无法对抗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13]，说明当时的襄阳的战势也还是比较危急的。襄阳是南入湖北的门户，刘表若是守江陵，怕是早已为外军所灭。

表 1 后汉书记载的东汉年间汉军与武陵蛮的战役表

年 代	汉军主将	汉军结果
建武二十三年	刘尚	失败
建武二十四年	李嵩、马成	失败
建武二十四年	马援	胜利
建武二十五年	马武	失败
元初三年		胜利
永和二年	李进	胜利
元嘉元年	应奉	招降
永寿三年	冯緄	招降
延熹五年	冯緄	胜利
和平元年	应奉	招降
永寿六年	陈奉	胜利
中平三年		胜利

纵观以上几点原因，笔者认为汉初如果定荆州州治在江陵以南是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原因的，而后东汉未定治所于江陵，是有着重要的军事因素的。两汉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国，荆州没有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所以治汉寿；汉末和三国时的群雄纷争，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襄阳和江陵的重要性凸显无疑，荆州治所就偏北，治襄阳。大概南方情急，荆州治所就

偏南；北方势危，治所就北移，与现实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从这一个治所的变迁，也可管中一窥汉家四百年史事，于古于今，慨有叹焉！

注释：

- ① 关于汉代的政区与治所，前人已有若干成果，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都已叙述了两汉时期的各州郡统辖范围及行政沿革。但是关于两汉州刺史的功能演变和治所研究，一直断续有论著发表。笔者见到较有说服力的有 2000 年第 3 期的《史学月刊》上汪清的《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辨析了州刺史部与十三州的关系；2005 年第 4 期《史学集刊》上周长山的《是惟主监察—还是兼及行政》，讨论西汉刺史的功能和权力演变。但是关于汉代刺史治所所在地的讨论学界还不多，特别是一些治所变动的州，如荆州。
-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中有：“(黄龙)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又《三国志·吴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中：“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

参考文献：

- [1] 汉书·武帝纪(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 [3] 后汉书·灵帝纪(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 [4] 汉书·景十三王传(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自王勇. 汉初长沙国独传五世原因新探[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2): 110-113.
- [7] 贺次君, 施和金. 读史方輿纪要(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8] 輿地纪胜·卷六十四(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2.
- [9] 三家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 [10] 三家注史记·楚世家(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 [11] 王子今. 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M]. 湖南社会科学, 2004, (5): 136-138.
- [12]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 [13] 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点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5.

Why Jingzhou's prefectural governors of Han Dynasty not establishing a capital in Jiangling

FANG K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hange of Jingzhou's capital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outhern famous town—Jiangling was not selected as the capital, which indicates many complex and realistic factors. First, observing from political geography, eleven regional capitals lay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so Jingzhou's capital, which lay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was of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Second, Jiangling had been severely damaged by the war which the Qin Kingdom attacked the Chu Kingdom. Thir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hen many suffered a great deal from wars in the south of China. Jingzhou's capital located at Hanshou;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wars happened i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Jingzhou's capital located at Xiangyang, which contacted osculately with actu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ircumstance.

Key words: Jingzhou prefectural governor; capital; Jiangling; Han Dynasty

[编辑：颜关明]

(上接 701 页)

- | | |
|--|--|
| <p>[4] 单凤儒, 李庆满, 邸彦彪, 等. 国有企业治理的利益驱动与制衡机制[M]. 沈阳: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117-118.</p> <p>[5] Ronald C. Griffin. The welfare analytics of transaction costs, externa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J]. <i>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i>, 1991, 73(3): 601-614.</p> <p>[6] Mishan J E. The postwar literature on externality: An interpretative essay[J]. <i>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i>, 1971, 9(1): 1-28.</p> <p>[7]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 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58-230.</p> | <p>[8] 樊纲. 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益[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69-70, 123-138.</p> <p>[9] 曹正汉. 民营经济发展与公有经济产权变革[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6.</p> <p>[10] 熊政平. 所有权配置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86-88, 105.</p> <p>[11] 张亚斌. 结构·系统·耦合——论所有制结构变迁与产业结构演进[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50-51.</p> <p>[12] 高明华. 权利配置与效率[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102-108.</p> |
|--|--|

The influence of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upon efficiency's formation

WANG Guoshun¹, LI Changjiang^{1,2}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Mid-South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sha 410014, China)

Abstract: Original arrangement, convergence and public degree are included in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They influence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through incentive mechanism,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allocative mechanism. Under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their transaction costs, governance mechanism, input resource, organizational costs and scale economics are variant, bringing about evident difference of efficiency.

Key words: Enterprise Efficiency;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s; Resource Allocation

[编辑：汪晓]